

19世纪传奇富商伍秉鉴

唐博

2001年,美国《亚洲华尔街日报》评选出1000年以来全球最富有的50个人。除了洛克菲勒、比尔·盖茨等当代巨富,成吉思汗、忽必烈、刘瑾、和珅、伍秉鉴和宋子文6位中国人名列其中。6人之中,伍秉鉴的名字是大众较为陌生的。他的商海浮沉,不仅折射出近代中国商人群体的起伏,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世纪前期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。

贵为官商

伍秉鉴(1769—1843)的家族世居福建泉州,康熙初年移居广东后开始经商。其父伍国莹早先是一家商行的账房先生,不仅充当会计,而且参与资产管理和投资贸易,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多有来往,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财产。乾隆四十八年(1783年),伍国莹投资成立怡和行,发展海外贸易。嘉庆六年(1801年),伍秉鉴子承父业,登上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前台。

伍秉鉴接管的是一笔潜力巨大的优质资产,因为怡和行名列“十三行”之中。“十三行”是清前期广州对外贸易中特有的商业利益集团,是官府招募的“身家殷实、居心诚笃”的商家,其数量并非限于13家,只是一个“因习俗特有的命名,用以区别于其他行口,并作为一个洋行商人帮派的统称”。它们一方面负有对官府承保、缴纳外洋船货税捐,以及传达官府政令、代递外商公文和管理洋船人等义务;另一方面也享有外贸特权,洋商的货物必须经由这些官府指定的代理商买卖。乾隆中叶以来广州一口通商的模式,使“十三行”在外贸领域的垄断地位愈发凸显。

在当时“官本位”和“重农抑



伍秉鉴

商”的社会氛围中,“十三行”的行商虽然贵为官商,也得通过捐官确保社会地位,比如说伍秉鉴就捐过三品顶戴。由于行商们大多捐有官衔,因而所起商名多带“官”字,既是一种尊称,又表明他们有一官半职。伍国莹和伍秉鉴的商名都叫“浩官”,以至于不少洋人将此当做他们的真名。怡和行主营茶叶贸易。尽管当时欧洲各国对茶叶质量十分挑剔,但怡和行的功夫茶一直被东印度公司鉴定为最佳,标以高价出售。久而久之,凡是装箱后盖有伍家戳记的茶叶,在国际市场上就能卖得出高价。怡和行兼营的房产、店铺、茶园等多多生意兴隆。据伍家自己估计,至道光十四年(1834年),伍秉鉴积累的财产达2600万两,相当于清廷近半年的财政收入,俨然是洋人眼中的“世界首富”。他在珠江两岸溪涧街的伍氏花园,堪与《红楼梦》里的大观园媲美。伍秉鉴对怡和行的经营如此成功,以至于1842年,已经成立10年之久的英商渣甸洋行,为借助怡和行的声望,专门更名为怡和洋行。

致富之道

作为行商,伍秉鉴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积聚巨额财富,主要有三方面原因。一是慷慨大方,诚信细心。



清朝时设立于广州的十三行商馆

伍家以外贸起家,以外贸发家。伍秉鉴经营外贸有长远眼光,常常表现得慷慨大方,讲求诚信,而且很有人情味。曾有一位美国商人替伍秉鉴承销一船生丝,利润颇丰,然而这笔货款并未按事前约定兑换成东印度公司股票,而是被美商挪用购买了一批英国毛织品,结果砸在手里,损失数千两。美商主动提出包赔,但伍秉鉴收下了这批滞销品,婉拒了美商的赔偿。另一个美国商人由于经营失当,欠了伍秉鉴7.2万两,因无力偿还而没法回国。伍秉鉴听说后,竟当面撕掉了借据,相当于免掉了这笔巨债。伍秉鉴此举,与锱铢必较的传统商业行为大相径庭,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。

不过,慷慨大方不等于到处施舍,伍秉鉴在经营上是一丝毫不苟、工于心计的。尽管怡和行收费高、业务忙,很多洋商还是愿意跟伍秉鉴做买卖。因为在他们看来,怡和行的商品质量和发货时间是值得信任的。

二是长期投资,放眼海外。伍秉鉴将有限的财力投入到几个关键领域,使得资本收益最大化。怡和行是“十三行”中的后起之秀。1811年到1819年,伍秉鉴向几家濒临倒闭的行商累计放贷200多万两,到19世纪20年代,怡和行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“十三行”的

“总商”(清政府在垄断行业特许商人中指定为首领的殷实商户)。怡和行还把投资延伸到海外。英国公司每年结束广州贸易前往澳门暂时,总会将货款交给伍秉鉴代管。公司资金周转不开,也向伍家借贷。以美国旗昌洋行为例,伍秉鉴不仅把它作为茶叶等外销产品的代理商,还对其注资入股,施加影响。此外,伍秉鉴还曾投资于美国的保险业、证券业,其子伍绍荣甚至向美国的铁路建设进行长线投资。据说伍家在美投资,每年可收利息银20多万两。

三是打通官府,迎合朝廷。伍秉鉴深知,行商纵然“富可敌国”,在官府面前也是弱势群体,随时有可能破产或者遭受牢狱之灾,所以搞好关系至关重要。自1801年至1843年,伍家以各种名义捐款160万两,“捐输为海内之冠”。他还曾介绍商馆的美国医生为林则徐看病。鸦片战争结束后,伍秉鉴带头倡捐26万两,以购买新式战舰,巩固海防。

神话破灭

虽然伍秉鉴一贯小心谨慎,最终还是还是在鸦片问题上栽了大跟头。道光元年(1821年),因怡和行担保的一艘外洋商船夹带鸦片被查获,伍秉鉴被革去三品顶戴。道光十九年(1839年)春,钦

差大臣林则徐带着禁烟的使命来到广州。伍秉鉴尽管没有参与走私鸦片这种肮脏的生意,但作为“总商”,对洋商监管不力就是失职。林则徐到后即责其传谕洋商限期缴烟,签署具结,保证不再夹带鸦片入境。然而,洋商置若罔闻,伍秉鉴两头为难,结果斡旋失败,锒铛入狱,虽有幸保住性命,却颜面尽失。林则徐随即派兵包围商馆,迫使洋商就范。尚未做好战争准备的英国人只得屈服,悉数交出了鸦片存货。这年夏天,林则徐在虎门海滩主持销烟。

次年,鸦片战争爆发。道光二十一年(1841年),英军兵临广州城下。伍秉鉴又被官府推上前台,力求调停。这是怡和行最失败的一桩生意,没有谈判的本钱,只能任人宰割。最终双方签署《广州和约》,清军退出广州城,并缴纳600万两银元赔款,换取英军不进广州城的承诺。伍秉鉴虽然承担了其中的110万两银元的赔款,但还是背上了“汉奸”的骂名。

道光二十二年(1842年)签署的《南京条约》,赔款2100万两,怡和行被摊派100万两。算上战争中被烧毁的价值七八十两银元的货物,怡和行在鸦片战争中直接损失近300万两。这一切,他只能以“赔财消灾”聊以自慰,甚至打算背井离乡,移居美国。

《南京条约》规定的五口通商,打破了怡和行赖以维持垄断地位的一口通商格局。条约第五款“凡有英商等赴各国贸易者,无论与何商交易,均听其便”的规定,则彻底毁掉了“十三行”的制度根基。怡和行的好日子到头了。

道光二十三年(1843年),伍秉鉴去世。13年后,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火摧毁了珠江沿岸的行商商馆,怡和行的历史就此终结。

作者简介

唐博,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,在清代康乾盛世、甲午战争等领域有一定研究,出版专著6部。

序与跋

此心光明 辛亥百年

裴钰

今年,辛亥革命迎来了100周年纪念日。

辛亥革命并非专指1911年(辛亥年)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,辛亥革命是约定俗成的说法,确切的含义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。1895年,兴中会在广州发动武装革命,明确提出了民主主义主张,推翻封建帝制、建立共和国,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由此拉开序幕。因此,今天我们追思辛亥革命,并非仅仅纪念辛亥年的武昌起义,而是要涵盖整个近代民主革命的历史阶段——1895年至1912年。

百年之际,追思过往,我慢慢发现了一个问题——今天,辛亥革命笼罩着一层淡淡的神秘面纱。人们对于辛亥革命的认识和理解,特别是青少年学生,简单地说是“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”。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工作,我们做了很多,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工作对普通读者,还远没有达到理想的教育、熏陶和引导的效能。我相信一场大革命,它不能沉睡在文献里,它也不是冰冷的文字,相反它应该时时刻刻流淌在每个人,特别是年轻人的精神血脉里。我们对辛亥革命的思考,不能停留在书斋里,不能停留在笔端,而是在山河之间,在情怀深处。

2010年10月至12月,我走访了武汉、中山、广州、香港、澳门、南京,考察辛亥革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情况,沿着辛亥革命酝酿、发生、发展、高潮、失败的历程,一步步走,一步步看,辗转五省六地,寻觅着一种文化

气息,回味着一种历史沧桑。

2010年10月10日,我在武汉机场落地,驱车渡江至武昌红楼广场。晚秋的风,天空灰蒙蒙,细雨微微。在武昌起义的各种回忆笔记中,对1911年10月10日的天气记录,也正是天色灰蒙蒙、大江苍茫、细雨绵绵。当年武昌起义,革命军冲出工程八营,夺取楚望台军械库,取得枪支弹药,又在中和门和蛇山安设炮阵地,齐轰都督府,一夜之间大清崩裂。1911年、2010年,同样的日子、同样的天气、同样的路线,此时此刻我庆幸自己在辛亥气息中呼吸,在辛亥沧桑中游走。

在汉口首义烈士陵园,我拜谒了辛亥无名烈士。从书里,你能真实地了解辛亥年汉口血战的残酷,北洋军机关枪队的血腥屠戮,清国海军舰炮的毁灭性打击,革命军战士的惨重死伤。离开汉口,我又来到武昌伏虎山辛亥烈士陵园墓群。深秋的清晨,踩着泥土,缓缓走上。本书“武昌起义”部分的铁血英雄,熊秉坤、孙武、蔡济民、刘公等人的坟墓或衣冠冢,都坐落在伏虎山上。我一直以为,一个人仅了解历史知识远远不够,对历史的把握,终极目标是情怀的共鸣。蔡济民写下一句诗描写辛亥革命:“无量金钱无量血”,正是这些勇士们想用鲜血换取中国的大平盛世。我扫了扫他们坟墓上的落叶,摘去碑上的枯枝,这里是他们的血,是他们的坟,而我要让他们在书中“复活”。

中山先生讲:“革命先烈的行为没有别的长处,就是

不要身家性命,一心一意为国来奋斗。”革命者没钱买武器,就自己制作和试验炸弹。秋瑾试验炸弹,炸残了自己的手。革命者没钱买棉布,晚秋时节孙武就忍着寒冷入睡。晚清时代,海外华侨挣的是血汗钱、苦力钱,但是为了祖国,还是把私人积蓄捐献了出来,正如中山先生说“内地同志舍命,海外同志舍财”。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。辛亥国人做到了这一点,这就是家国情怀!

这就是,我详细考察了武昌、汉口等地的辛亥革命遗址;在中山,拜谒了孙中山故居;在广州,拜谒了黄花岗烈士陵园;在香港,走访了中环中环,100年前这里是革命党人的主要活动地区;在澳门,拜谒了孙中山纪念馆;在南京,拜谒了相关的辛亥革命遗址、学术机构,等等。历史知识在档案、典籍、文献、资料、笔记之中,它是静止的,是凝固的,是安详的,是坚硬的;历史情怀在我们的千里行走之中,它是涌动的,是蓬勃的,是鲜活的,是柔软的。因此,我愿意用自己的笔,去记述一个鲜活生动的辛亥情怀。王阳明说过一句名言:“此心光明,亦复何言!”辛亥百年,躬逢其盛,我以“光明”之心,乐观写作,只为在辛亥百年之际,尽到一个知识分子的义务和责任。

(此文为《走向共和,你所不知道的辛亥革命》的序,文章有删节,本书已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7月出版)

《中国人的病》

沈从文不仅是位极具个性和内涵的文学家,而且是位人生与社会问题的思想家,在其文字背后,隐藏着宏阔的社会主题和悲悯人生的生命哲学。本书精选了沈从文各个时期关于社会与人生问题的思考,编选视角独特,所选文章均具代表性。沈从文(1902—1988),湘西凤凰人,作家、文物研究家。14岁投身行伍,后曾任教于山东大学、西南联大、北京大学,代表作有《边城》、《从文自传》、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等。

(刘红庆 编选 新星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)

《忽然想到——画说·说画》

陈四益是与《读书》杂志合作20余年的老作者,文章短小精悍,文笔老到,他与漫画家丁聪合作的文配图专栏广受好评。近几年,陈四益与黄永厚合作的专栏“画说·说画”继续在《读书》每期的封二上出现。有时是先有文章,图画配合之,谓之“画说”;有时是先有图画,文章配合之,此为“说画”。同时,二人合作的文配图也陆续发表在《同舟共进》、《悦读》等杂志上。本书就是二人合作作品的集结。随便翻开一页,便可见两位作者辛辣的笔锋,无论是“说”还是“画”。

(陈四益 文 黄永厚 画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8月出版)

《寻味·英伦》

这是一本有关英国饮食与文化的笔记。那些散发出迷人香味的苹果、早已失去本意的英式早餐、历史悠久的炸鱼薯条、街头烤土豆、英国化的法式点心、甜蜜的巧克力、只有在夏季登场的鲜艳欲滴的草莓加奶油……作为一个外乡人,作者以客观的立场观察着英国人的生活与文化。无论是英国人的酒吧习惯,抑或是英国下午茶,她都能用一种细腻而调侃的笔调道来,以食物考察人情人性。同时,诉诸味觉的食物也成了一段段人情故事的作料。

(张帆 著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8月出版)

《历史的“暗室”——周海婴早期摄影集(1946—1956)》

作为鲁迅的儿子,在公众的眼中,周海婴只是一个伟大父亲的“护旗手”,他的大半生似乎都生活在一种家族荣誉的心理重负中。直至他生命的最后几年,人们才发现在周海婴的背后还有一个巨大的精神“暗室”——摄影。他用自己的镜头记录文人脾气、平民苦乐、都市节奏、小镇风俗,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的变迁。有评论家认为,这对父子各自见证了嬗变的时代,但他们选择了不同的表达方式:在书写时代,鲁迅以入木三分的文学描述清末民初的众生相;在影像时代,周海婴沉溺摄影,留取了民国末年接连共和国之间的韶光。

(张永林 周令飞 编 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)

《哈佛家书》

这不是一本教你如何把孩子送进哈佛大学的教育秘籍,只是真实地记录了一个中国哈佛女孩与父亲之间多年的经历,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,以及其间的相关感受、交谈、回忆等。作者说,不是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去念哈佛,经过这几年与女儿之间的交流,他认为比读哈佛更重要的是让孩子拥有改变自身命运的哈佛精神。作者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,后赴美,先后任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计划访问学者及新闻传播学院客座讲师、北美商社董事长等职,并于2011年出版了《中国式百万富翁》,引发关注。

(〔美〕建国 著 作家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)

《宋词鉴赏大辞典》

本书收录了宋代276位词人的1001首词作,以宋词注释、鉴赏为中心,以知识链接、品评和配图等形式将宋代社会文化生活诸多方面纳入介绍范围,将词这一文学艺术形式的发展置于社会发展整体背景下,较为概括地呈现给读者前人所创造的辉煌文化成就,有利于读者对宋代文化发展的全面把握。

(清华大学中文系《宋词鉴赏大辞典》编写组 编 中华书局2011年9月出版)



清史探秘
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
中国文化报社办

《朱镕基讲话实录》问世

本报讯 (记者续鸣)《朱镕基讲话实录》日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,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国财经出版社向全国发行。

《朱镕基讲话实录》共四卷,收入了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、总理期间的重要讲话、文章、信件、批语等348篇,约123万字;收入了照片272幅,批语、书信及题词影印件30件。书中文稿是根据朱镕基出席重要会议和到地方、部门考察调研讲话的音像资料、文字记录稿编辑而成,绝大部

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。

朱镕基在今年4月参加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表示:“这本书的特点是讲真话,不讲套话。”全书内容涉及财税体制改革、金融体制改革、国有企业改革、政府机构改革、社会保障体制改革、投融资体制改革、住房制度改革、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、治理通货膨胀等经济社会各领域重大问题,反映了朱镕基在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的工作历程,内容丰富,语言生动,图文并茂,具有可读性和史料价值。

郑州发布阅读调查报告显示

16岁以下人群阅读量最大

本报讯 近日,河南省郑州市推广阅读志愿者发布了刚刚完成的《第四次郑州市市民阅读状况调查报告》。调查显示,随着年龄、收入的增长,市民读书量呈现出中间低、两端高的“山谷”形态。

据悉,这份《郑州市市民阅读状况调查报告》是继2008年后,郑州市的推广阅读志愿者第4次对市民进行阅读调查。调查的发起人郑州市新华书店读者俱乐部副经理路毅称,从年龄分布看,16岁以下青少年和50岁以上的人群由于拥有较多空闲时

间,为其扩大阅读提供了条件。16岁以下人群阅读量最大,每季度读书10本以上的人数超过20%。但30岁以上的中年人中,1/5的人每季度读书不足1本。

路毅称表示,值得关注的是,16至22岁和22至30岁两个年龄段人群较同期读书量下降明显,这分别是中学至大学、毕业至就业的两个阶段,如果因为课业或工作压力大而早早放弃自我充电,青年将很快感到后继乏力,在未来专业方向的积累和发展上会遇到瓶颈。(汤荔)

《十一味爱》讲述都市人的爱情

本报讯 (记者李静)近日,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《十一味爱》与读者见面了。全书由11篇中篇小说构成,讲述了大城市里平凡人的11个爱情故事,文字朴实,于细致处打动人心。

作者文珍是北京人,也是内地第一位以一部小说获取文学硕士学位的人。中国当代文学不缺乡村小说,缺的是都市小说,而文珍写的就是这样的都市小说。文珍的作品数量不多,却篇篇精品,她的小说写了当下都

市人的真实生活,写“那些被林立的楼宇遮挡、被密集的车轮碾压的爱情”,只为展现最真实的人生。在《十一味爱》的后记中,文珍写道:“《桃花扇》里的唱词道:‘暗红尘霎时雪亮,热春光一阵冰凉。’但愿自己能写出生命里的暗和光,又写出那况味的热与凉。”著名作家苏童认为,书中所记录的爱情“如此琐屑卑微,又如此敏感真切,加之文珍精致的语言,绵延不绝的形象描述,确实好看”。